

【自白】

方寸之间的较量

□本报记者 高玉璞

我是一副来自战国时期的腰扣，虽然已经2000多岁，但风采丝毫不减当年。不说别的，单凭我这600多克重的纯金体格，即使在今天，身价也不菲。

我的主人是匈奴部落首领，为了显示他的位高权重，便用黄金将我打制成饰牌，当作他的腰带扣。

在匈奴人心中，动物搏斗象征力量与生存竞争，于是，我的身上便有了猛虎与野猪咬斗的画面。猛虎代表一方，野猪代表另一方。

猛虎与野猪都是凶残的野兽，它们相遇，必定“你死我活”。工匠便把这个场景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身上。只见猛虎右前肢卧地支撑全身，大张着嘴，恶狠狠地咬着野猪的右后腿不放，挥起左前腿，左爪使劲抓着野猪的左后腿，将它凌空翻转。处于下风的野猪，张开大嘴，死死咬着猛虎的右后腿，不敢有半点放松。猛虎忍着剧痛，反转后半身，2条后腿分别压着野猪的2条前腿。身形矫健的猛虎势在必得，尾巴竖立的野猪双目圆睁，惊恐万分。猛虎与野猪咬斗的激烈场景，在工匠精湛的浅浮雕技术下，生动地展现在金饰牌的方寸间。

工匠特别注重细节的处理，将猛虎和野猪的皮毛用不同的手法表现：虎的须毛刻画精细，皮毛上的条纹用柔美的弧线表现；野猪的鬃毛用短而硬的直线表现。最后，在饰牌边缘装饰了绳索纹。

虎豕咬斗纹金饰牌出土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布尔陶亥乡



工匠特别注重金饰牌的细节处理，将猛虎和野猪的皮毛用不同的手法表现：虎的须毛刻画精细，皮毛上的条纹用柔美的弧线表现；野猪的鬃毛用短而硬的直线表现。最后，在饰牌边缘装饰了绳索纹。

虎噬豕咬饰牌威

□本报记者 高玉璞 通讯员 奥东慧

虎豕咬斗纹金饰牌

长13厘米，宽10厘米。
一件重291.4克，一端有穿绳孔。另一件重330克。



无孔的金饰牌(正面)

(本版图片由鄂尔多斯市博物院提供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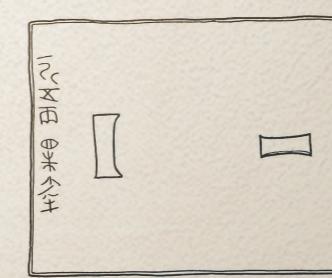


有孔的金饰牌(正面)



有孔的金饰牌(背面)

边缘刻有“一斤二
两廿朱少半”铭文。



无孔的金饰牌(背面)

边缘刻有“一斤五两
四朱少半”“故寺豕虎三”
铭文。

“一斤五两四朱少半”是金饰牌的重量；“故寺”是制作器物的官府；“豕虎”是饰牌上的图案内容；“三”为编号。

中华文明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，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。虎是我们先民崇拜的图腾之一，也是人们认为可以趋吉避凶的祥瑞之物。在古代文献中，虎被称为山君、寅客；在文学、艺术以及广泛的民间传说、神话故事中，虎的形象无所不在。

奥东慧指着金饰牌上虎豕咬斗的图案介绍：“古代，北方草原地区制作金器以捶揲技法为主，而虎豕咬斗纹金饰牌则采用中原先进的失蜡法。战国晚期，动物咬斗纹造型已达到精致的程度，这个时期出现的动物后肢反转纹、搏噬纹和怪兽纹，是鄂尔多斯青铜器动物纹造型艺术的精华。虎豕咬斗纹金饰牌打破了饰牌通常采用的对称构图，运用了极具特点的后肢反转动物纹，定格了猛虎和野猪咬斗的瞬间，内凹的图案背景将猛虎和野猪的立体感凸显了出来，展现出动态美。整个饰牌不但构图充满动感，还将动物撕咬搏斗的生动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。”

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工作人员奥东慧介绍：“鄂尔多斯青铜器包含大量饰有虎纹样的青铜器，在兵器、车马器、装饰物中的饰牌、带扣、项饰中等都有体现。饰牌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具特征的器物，也是装饰虎纹最主要的器物。虎豕咬斗纹金饰牌造型规整，主题鲜明，图案设计灵动，具有明显的游牧风格，同时又表现出浓郁的中原文化因素，是战国晚期至秦代，我国民族融合、农牧文化交往借鉴、创新发展的精品文物。”

仔细观察虎豕咬斗纹金饰牌，体积虽小，却大有乾坤，它蕴含着中国北方游牧部族的文化因素、艺术特征及思想，是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融合的见证。虎豕咬斗纹金饰牌上刻着的汉字，字体接近于战国晚

期秦人的书写风格，尤其刻着的衡制单位，弥足珍贵。高兴超介绍，“一斤五两四朱少半”铭文，指的是金饰牌的重量，这对我们研究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衡制单位有着重要的意义；“故寺”铭文有专家认为这是制作器物的官府，因为“寺”是官府办公的地方，秦汉铭文中常见“寺工”，设有工师和工匠；“豕虎”铭文指的是饰牌上的图案内容；“三”为编号。这种铭文内容及格式，具有中原地区官方管控下手工生产制作的时代特点。这副金饰牌证明了当时在云中郡地区，匈奴人与中原人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和交流。

出土虎豕咬斗纹金饰牌的墓葬，主人是一位男性，遗物很多，都是比较精致的金银器。专家推测，墓主应该是一位匈奴部落酋长。《战国策·赵策》记载：“赵武灵王赐周绍胡服衣冠，具带，黄金师比。”这里所说的“黄金师比”，指的就是类似虎豕咬斗纹金饰牌这样具有带扣功能的长方形金饰牌，只有王侯贵族才能佩戴。虎豕咬斗纹金饰牌用作腰带构件系在腰间正中，显示出其主人尊贵的社会地位和权力。

历经两千年，虎豕咬斗纹金饰牌依然折射出意蕴深厚的光芒，在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

观点

源于生活的艺术

□高兴超

鄂尔多斯青铜饰牌是北方游牧部族佩戴在服饰、腰间、马具等上的装饰物，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具特征的器物，富于变化，栩栩如生。鄂尔多斯青铜饰牌按照形制可以分为两大类：一类平面形制，呈长方形或近似长方形，整个饰牌边框鲜明，以绳索纹、连续的几何纹、网纹等纹饰进行装饰，在框内布局图案时，常采用浮雕、透雕、锤揲、阴刻等工艺，展现具象或抽象的动物造型；另一类饰牌则平面略呈长方形，但是整体没有固定的边框，饰牌上动物的头部略宽，尾端略窄，业内通常把它们称为“P”形或“B”形饰牌。

大多数饰牌均为成双成对出土，值得注意的是饰牌虽然有着相同的图案，但是方向却是相反的。古人在佩戴饰牌时，将其一左一右饰于腰带前部，还有一些饰牌其中一件的边缘处有类似于带扣环面上的鸟喙状凸起，所以它们应当同时具有带扣的功能。

艺术源于生活，像虎豕咬斗纹金饰牌这种以动物撕咬搏斗为题材的饰牌，在鄂尔多斯青铜器饰牌的装饰中表现极多，是北方游牧族生活实践的结晶，也是他们在长期生产中创造的一种实用艺术。

北方游牧族有着游牧族的经济方式，他们逐水而居，以畜牧业为主，衣食住行都与动物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在游牧日常生活中，他们经常看到动物捕食、撕咬、搏斗等场景，通过长期观察，掌握了它们的形态，并通过高超的技艺，将草原上特有的弱肉强食的现实场景通过饰牌方式记录和表达出来。

虎纹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纹样，上至商代，下到两汉，时代延续性强。虎纹的造型主要分为四种：一是只表现虎首的造型。二是个体虎的造型，静态中的虎呈卧姿或立姿。三是群兽咬斗的造型。四是写实性与图案化结合的造型。战国晚期，虎纹饰牌十分盛行。

（作者系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副院长、副研究员）

史话

斑驳虎纹佑平安

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，虎的身影早已跃动于先民信仰的图谱里。距今60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，蚌壳摆塑的龙虎造型隔空对望，翻开了中华文明“龙腾虎跃”的序章。这只被神化的猛兽，在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间低吼，在王侯将相的玉佩上遨游，编写着从图腾崇拜到权力象征的文化密码。

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罐碎片，上面有先民用烧黑的木棍画的抽象虎纹。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对玉雕虎眼，2块仅指甲盖大小的墨绿色玉片，阴刻线精准勾勒出吊睛白额的虎目特征。这些距今数千年的遗物告诉我们，人类先民早已把虎的形象刻进文明的基因链。

商周时期，虎形器物迎来第一次爆发式创作。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青铜虎食人卣(yǒu)，将猛虎噬人场景凝固成礼器：虎口大张，凶狠地含着人首，虎爪却温柔地环抱人体，寓意“畏而不杀”。三星堆青铜神殿顶部的飞虎构件，虎耳演化为夸张的云雷纹，虎尾卷曲为通天神树，把猛兽形象升华到通天接地的“桥梁”。甲骨文中，“虎”字出现频率达189次，常与“王”字并列出现在祭祀卜辞里，意味着商代人们已将虎视为王权的具象化身。

西周，人们把这种崇拜推向实用美学。宝鸡弓鱼国墓地出土的黄金虎符，用失蜡法铸造出细如发丝的虎斑纹，符身暗藏雄卯“机关”，当两半符合扣时，猛虎的眼睛会自然下垂，完成“身份验证”的眨眼步骤。在山西晋侯墓车马坑，考古学家发现整套青铜马具都铸有虎形纹饰，连马镳这种拇指大小的部件都浮雕着完整的虎头。这种近乎“强迫症”的装饰风格或许源于《周易》“云从龙，风从虎”的原始信仰，人们相信猛虎纹饰能让战车获得风的速度。

这些穿越时空的虎形文物，犹如一部微缩的文明交融史。当周天子把玉虎佩赠予诸侯，当匈奴贵族将黄金虎饰牌系于腰间，虎纹饰牌已超越器物本身，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的纽带。

（雷焕 供稿）